

田子渝 著

# 李汉俊



## 中共一大代表丛书

主 编 郑 惠 张静如

副主编 张树军 萧 寒 肖功柄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中共一大代表丛书**

主编 郑 惠 张静如

副主编 张树军 萧 寒 肖功柄

**李 汉 俊**

田子渝 著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850×1168毫米 1/32 7.125印张 170,000字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12.00元

ISBN 7-202-02212-5/K · 566

# 总 序

---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她的名字叫中国。她有过自己的辉煌。

然而，当世界之舟驶入近代港湾时，这条巨龙却喘息着落伍了。

20 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满目疮痍。无数觉醒的中国人以各种方式，探寻着救亡图存的道路。

当时间老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蹒跚地走进 20 世纪 20 年代的时候，一件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件悄悄地降临了。

1921 年 7 月，13 位年龄不一、口音不同、装束各异的年轻人，肩负着全国 50 多名党员的重托，在上海秘密聚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这次被命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性聚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会场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骚扰以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好

DK21/19

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一个新的革命火种由此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了，中国历史将由她谱写出全新的篇章。

斗转星移！

在 20 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当年仅有的 50 多人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 5800 多万党员的执政党。在中国共产党产生后 76 年的历史过程中，她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经坎坷，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和举世瞩目的成就。

如今，参加中共一大的 13 位代表都已过世。追寻他们的人生足迹和思想历程，从中探求人生的价值，寻觅历史发展的轨迹，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成为后人特别是历史学家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

大浪淘沙！

当年一同参加中共一大的 13 位代表，由于种种原因，后来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毕生为党的事业奋斗者有之，为人民的解放而献身者有之，中途脱党者有之，背叛革命者有之，沦为汉奸者有之。他们的曲折经历，尽现了复杂离奇的社会变迁，折射出剧烈动荡的时代特点。

这种情况，也就成为后来人研究中共一大代表的难点所在。

多少年来，研究 13 位代表的生平和思想，为他们各写一部传记的想法，一直萦绕在我们的脑海。这也是我们作为史学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1995 年七八月间，我们和河北人民出版社经过周密策划，邀请有关专家学者，正式启动了这一工程。

历史著作和人物传记的生命在于真实。只有真实，冷冰冰的书籍才会流淌生动的音符，才会涌动生命的活力。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材料和方法。历史人物的传记写得成功与否，全赖于此。有了准确的材料和科学的方法之后，最重要的是搞清楚和把

握住历史人物一生最根本的追求是什么，并把历史人物活动的时空环境尽可能地再现出来，把历史的真实再现出来，从而给历史人物一个比较准确的历史定位。这样写出来的历史人物传记，才会给读者一个大体逼真的历史人物形象。这也正是我们这套丛书所努力的目标。

为此，我们提出了四条编写原则：（一）据实直书而不拘泥于定论，以确凿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实事求是地秉笔直书，注重思想性、科学性、学术性。（二）史料丰富而不至于芜杂，挖掘和采用真实可靠的具有历史价值的史料，去粗取精，摈弃似是而非、查无实据的材料，严禁杜撰情节。（三）重点突出而不平铺直叙，结合社会历史背景，突出写传主的活动，以人和事贯穿全书，兼顾传主的思想发展和个人生活，写出传主的性格特点和人生色彩。（四）文字生动而不求浮艳华丽，力求达到语言生动活泼，优美流畅，有较强的可读性。

基于上述目标和原则，同时也考虑到13位代表各自不同的多面人生，我们在编写这套丛书时，还强调发挥各本书作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作者可以阐发自己的观点，体例和风格也不强求完全一致。人物传记本来就没有一种模式、一个套路。作者在求真的前提下，以不同风格、不同体例来撰写人物传记，也可体现出人物传记写作的多样化和丰富性。

历时两载，我们编写的这套丛书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如果读者朋友特别是青年朋友能从这套丛书中得到或多或少的收获，那将是我们的最大快乐和欣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周佛海、陈公博、张国焘等人先后走上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是何等的重要。对于这些人，我们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把他们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直

书他们的人生，分析他们的变化，其目的，一是真实地反映历史，二是希望从中得出一些有益的教训。

回过头来看这套丛书，我们所确定的目标和原则，可以说有些达到了，有些则还没有达到，或者说没有完全达到，留下了一些遗憾。这一方面是由于挖掘的资料还不够充分，另一方面，也与我们的水平和方法有关。我们热忱地欢迎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最后，我们还想强调两点：一是我们在编写这套丛书时，参考了许多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吸收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借本书出版之际，对这些同行表示诚挚的谢意。二是我们在编写这套丛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史学界、出版界以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特别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10余位专家顶着酷暑，为我们审阅了全部书稿。对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和全力帮助，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郑 惠 张静如**

1997年8月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走出荆楚大地      | 1  |
| 东渡扶桑            | 1  |
| 确立救国的道路         | 7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   | 18 |
| 宣传唯物史观          | 18 |
| 《马格斯资本论入门》      | 29 |
| 高举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大旗  | 35 |
| 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 42 |
| 第三章 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奋斗 | 52 |
| 大力进行建党的革命宣传     | 52 |
| 发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 62 |
| 在中共“一大”上        | 68 |

## 2 李 汉 俊

|                 |     |
|-----------------|-----|
| 坚信马克思主义志不移      | 79  |
| 第四章 时事评论和文学艺术   | 87  |
| 时事评论            | 87  |
| 文学评论            | 98  |
| 外国小说与话剧         | 111 |
| 第五章 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   | 119 |
| 热情投身劳工运动        | 119 |
| 初探工人运动的理论       | 129 |
| 评介美国 I. W. W    | 139 |
| 第六章 艰难、曲折的三年    | 147 |
| 在武昌高师           | 147 |
| 令人痛惜的错误         | 155 |
| 五卅运动前后          | 162 |
| 《中国无产阶级及其运动之特征》 | 170 |
| 第七章 最后的岁月       | 178 |
|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 178 |
| 与国民党右派作斗争       | 187 |
| 不幸遇难            | 196 |
| 评价与回忆           | 203 |
| 主要参考书目          | 213 |
| 后记              | 215 |

## 第一章

# 走出荆楚大地

## 东渡扶桑

在中国湖北中部有一个古老的县—潜江（今潜江市），在公元前5世纪，这个地方就有了历史记载，原属于楚国章华和竟陵。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正式用现名，建县城于豆子湖，隶属湖北路江陵府。民国二年潜江属襄阳道，1926年改为省辖县。

潜江地处江汉平原中部，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是我国主要的商品粮棉产区。西靠近长江；汉江从县内北边日夜不息地流过，汉江的支流东荆河纵横东部县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楚文化的熏陶下，这儿人才辈出，仅在近代就涌现出资产阶级革命家傅慈祥、刘静庵等。

本书的主人翁也是其中的一个。这位从荆楚大地走出去的烈士原名李书诗，号汉俊，又名李人杰。生于1892年（光绪十八年）阴历三月初十。他的家乡湖北潜江沱埠垸（今潜江杨市袁桥乡）虽是我国中部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优越的地理环境却没有给劳动人民带来温饱，稍有天灾，广大的农民就四处逃荒。这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他出生在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李金山(1844—1919,字凤亭、晚年别号老迂)从小刻苦用功,尤善书法,打下了扎实的旧学基础。长大后走上了传统的科举道路,但屡试均落第,直到38岁才中了秀才。为了谋生,他在乡间或城关当上了塾师,过着清贫的生活。李金山正处在国势日衰的动荡年代,西方列强掀起了一阵阵瓜分中国的浪潮,民族灾难日益深重,激起了包括李金山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的强烈忧患意识。他执教时,经常教育学生勿忘国耻,好好学习,掌握救国的本领,将来为国家效力。

李金山共有7个孩子(三男四女),长子书麟早丧。他将希望寄托在次子李书城和三子李汉俊身上。他以军事、工商业为富国强兵之道,训勉李书城习军事,李汉俊学工商业,“各成专材以备国家用”。<sup>[1]</sup>李金山的殷殷爱国之心,在李汉俊的幼小心灵里埋下了深深的根。

李书城对李汉俊的最初的成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李书城(1882—1965),字晓园,又名筱垣、小垣。在仕途中,李书城要比他父亲幸运得多。在16岁时,就中了秀才。那时他头上留着长辫子。也许是为了图个吉利,大人在他的辫子上扎了一根红绒线,所以乡邻们叫他是“红绒线辫子的小秀才”。1899年他离开了闭塞的家乡,来到省城武昌,入经心书院。这所由湖北开一代新风的张之洞创办的高等学府,开设了西方近代教育课程,极大地开阔了李书城的眼界。他开始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结识了革命党人吴禄贞<sup>[2]</sup>。

1902年李书城被张之洞选派到日本,初入东京弘信书院速成师范学习,后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那里他拜访了孙中山,结交了黄兴,开始投身革命。他和友人组织湖北同乡会,创办了《湖北学生界》(后易名《汉声》),宣传反清、爱国的民族思想。

1904年，年仅12岁的李汉俊，在吴禄贞的资助下，也东渡扶桑。他留学日本不是孤立现象，是随着中国近代留学热潮而踏上了东方的岛国。中日两国传统友谊渊源流长，但到近代中日关系出现了奇特现象。在政治上，日本自从明治维新后，迅速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它在脱亚入欧时，走向了向外扩张的道路，中国首当其冲。日本这个不到中国4%面积的弹丸小国，却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天朝上国。但在文化上，中国竟出现了空前的留日热，大批的青年学生涌向扶桑之国。就在李汉俊到日本的这一年，中国留日学生就有近5000人，与李汉俊同赴日本的湖北留学生有420人。到1906年，留学热达到高潮，有上万学子东渡。中国留学日本运动延续时间之长，人数之多，所习学科面之广，都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为什么昔日留学生派遣国——日本会变成留学生教育国，而留学生教育国——中国却变成留学生派遣国呢？为什么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渡海到令中国蒙上奇耻大辱的敌对国——日本去拜师求知识呢？

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商品和毒品砸开了中国腐朽的长城，使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1894年第一次中日战争，日本打败了中国，强烈地震撼了中国朝野上下。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先进中国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很快他们发现，中日的差距主要在学习西方的差距上。日本自“大化革新”以后，持续1200年左右时间的封建社会，到19世纪中叶，与中国一样，同样遭到了西方列强的侵袭，受到沦为殖民地社会的威胁。日本于1868年开始了大规模学习西方的变革的运动，很快从封建社会转变为拥有强大军事和经济实力的资本主义的近代化的国家。随着这个历史进程，日本大量翻译出版了西方文化书籍，几乎全方位的引进近代文化。

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今日之日本，其于吾国之关系，则犹

桥耳。数十年以后，吾国之程度，积渐增高，则欧美各国，固吾之外府也。为今之计，则莫如首就日本。文字同，其便一；地近，其便二；费省，其便三；有此三便，而又有当时维新之史，足为东洋未来国之前鉴。”<sup>[3]</sup>也就是说中国绝大多数留学生是抱着救国、强国的梦而负笈东渡，企图通过日本这座“桥”，去挽救面临瓜分危机的祖国，使它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因此本世纪初的留学热是中国人民进行救亡图存，将祖国建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的重要一部分。

正是这股强劲的世纪潮，将他与许多热血青少年送到了一衣带水的邻国。在那里，李汉俊和李书城住在一起，耳濡目染，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熏陶。他最初进入一个叫晓星的法国教会中学校读书，后入第八高等学校（大学预科）。1915年7月，他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学科。这时他成为清政府的官费生，住在东京牛込区白银町33番，先后由刘震新（湖北沔阳人）、言微（江苏常熟县人）作保证人。1918年7月19日毕业。从他在该校的成绩单看，他的学习成绩很一般，三年各科的平均成绩分别为69.8、69.1、67.8，毕业论文评点是65分。由此看来，他的心事不完全用在学习上。

事实也正是这样。他处在民族危机四伏的时代，他和他的中国同学，绝大多数是无法安心读书的。那时中国政潮波澜起伏，袁世凯复辟、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南北战争、段祺瑞政府的媚日卖国……这些都在中国留学生中掀起了一阵阵狂涛。如何救国成为他们首要思考的问题。要救国就要有救国的思想和主义，李汉俊正在苦苦地寻找救国的思想武器。

他成绩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对日本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和死板的考试方式的愤恨和抗争。他在《我的“考试毕业”观》（《星期评论》第44号，1920年4月4日）作了披露。日本考试，

只要第一、二次考试考得好，得到老师好的印象，那么以后的成绩就与前次的差不多。如果第一、二次考得不好，那么就永远也不要想得到好的成绩。他进帝国大学时的第一次考试，碰巧住地失火，将他的所有书籍笔记烧的干干净净，“于是此后成绩就受打击，发表底结果很坏。自此以后，就永远跳不出后二十名了。”

这时的日本正是社会激烈动荡的大正（1912—1925）时期，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确立了世界强国的地位。这一显著变化，一方面推进了日本军国主义，加强了日本国民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社会潜在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以上两个原因在日本造成了东西文明的比较和社会主义的传播。在思想上，单纯的崇拜西方的热情明显衰退，同时，国粹主义也失去了根据。人们急迫寻找一种寻根于日本的社会与现实，树立独立的文明倾向愈来愈浓。在寻求新思想的时候，社会主义的传播形成了高潮。

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是从甲午战争后开始的。1898年10月，日本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后改为“社会主义协会”），幸德秋水、堺利彦、片山潜、山川均等成为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伴随社会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在日本迅速得到传播。中国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最初也是通过日本这座“桥”而树立的。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施存统<sup>[4]</sup>等，均是从日文中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李汉俊也不例外，他毅然放弃了最喜爱的数学，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在思想上超越了兄长李书城。

在日本学习期间，他认识了两个激进的青年，后来他们共同战斗在五四新文化战线上，成为我国思想界耀眼的新星。一个是戴季陶（1891—1949），原名传贤，学名良弼，字选堂，又字季陶。因戴氏先祖出自安徽，后迁居浙江，他生于四川广汉，所以他自称自己是“蜀中野人”。自幼受到传统的教育，聪悟敏颖，有神童

制目，但早年科举考试，却落第，使这位后来长期担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的人与科考生无缘。1903年他考入成都客籍学堂高等科，在学习期间，第一次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16岁时，到日本东京留学。这一年，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国同盟会。他初入师范学校，后转入日本大学，专攻法科。虽然他追随孙中山先生是后来的事，但很显然那时他已被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所感染。

1909年夏戴季陶归国，曾在苏州任职。半年后到上海，初在《上海日报》担任编辑，后就职《天铎报》，不久担任该报的主笔，同时他为同盟会员于右任办的《民立报》撰稿。此时他开始用“天仇”的笔名写文章，表明他与腐朽的封建王朝实行彻底的决裂。他的文章针砭时弊，笔挟风雷，使其名声大振，也使《民铎报》成为“提倡民族主义，鼓吹排满”的最具有影响的十三种报纸之一。1911年春，因鼓吹革命而遭到清政府的通缉，亡命日本。不久应好友雷铁崖（昭信）的邀请，到南洋，担任《光华日报》编辑。在那里他参加了中国同盟会，从此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辛亥武昌首义爆发，他立即赶到汉口，与革命军一起，参加了阳夏保卫战。后到上海，上海光复后，办《民权报》，鼓吹革命。

1912年9月，孙中山先生受任督办全国铁路事宜，他被聘为孙中山的（机要）秘书，直到孙中山先生逝世。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总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孙的身边。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再次出走日本，协助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直到五四运动前夕，他仆仆于中日之间。

另一个同志是沈玄庐（1883—1928），名定一，字剑侯，别号玄庐。浙江萧山人，生于福建顺昌。早年入县学，为邑庠生，后用一万元得任云南广通县知县。1908年到日本，与中国同盟会接触频繁，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参加上海光复、南京战役等。次年组织公民急进党。二次革

命失败后，遭通缉，亡命日本、新加坡等地。1916年浙江议会恢复，被选为省议会议长。护法战役失败后，到上海开始注意社会主义问题。

戴、沈在日本期间，或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日本大正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思想上均曾倾向社会主义。所以他们在上海与李汉俊重聚时，很快找到了思想上的共同点，成为我国最初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之一。

李汉俊在日本是十分活跃的，他结识了一些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倾向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进步人士。他的活动引起了日本外务省的密切注意，派人加以监视。这一点从日本警视厅总监的有关报告中可以得知。1920年6月，施存统到日本，经过戴季陶、李汉俊的介绍，认识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堺利彦、高津正道和宫崎滔天等。1921年4月，李汉俊也到日本，与施存统一道，与日本社会主义者一起，拟发行秘密出版物，并且协商出传递出版物的办法。他的行踪不明，日本警视厅派人对他“给予严密监视，并继续进行暗中侦察。”<sup>[5]</sup>

## 确立救国的道路

1918年岁末的一天，李汉俊乘船回国，当褐色的海岸线出现在他眼前时，一个埋藏在心底很久的感情一下子迸发出来：“祖国！中国！故乡！”他扶了扶眼镜架，与同伴们情不自禁欢呼起来。

李汉俊回到上海后，初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湖北善后公会对面的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内。在那里他与同邑友人詹大悲为邻居。这位老乡比李汉俊长5岁，有着非凡的经历。詹名培翰，又名翰，字质存，1887年8月3日出生于湖北蕲春。1907年投考湖北黄州府中学堂时，就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

与宛思演、梅宝玘等组织证人学会，在同学中传播革命思想。1908年到汉口办报。1910年12月，任《大江白话报》主笔，后将报名改为《大江报》。与此同时，他参加革命团体文学社，担任文书部长。1911年7月26日，他在《大江报》上刊登署名文章《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为此被清政府逮捕，在法庭上据理力争。《大江报》案使他名声大噪，一时成为全国新闻人物。

辛亥武昌首义，他被迎出狱，立即在汉口成立军政分府。汉口失守后，东走九江、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14年在日本成为孙中山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的第一批成员。1915年回国，准备回湖北策动反对袁世凯的武装起义，不幸在上海被捕。袁世凯死后，才获释。以后到广州参加护法。护法运动屡屡受挫，他来到上海，重新思考革命的道路究竟应该如何走。正当这时他结识了李汉俊。他与这位新识的小同乡一见如故，俩人合作翻译了日本佐野学作的《劳动者运动之指导原理》，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

1919年初春，董必武、张国恩<sup>[6]</sup>从鄂西到上海，客居湖北善后公会。詹大悲与他们是多年并肩战友，特别是与董必武为莫逆之交。他们早在辛亥武昌首义时，就结识于江汉。起义爆发后，董必武激动万分从偏远的家乡赶到省城，投身革命，参加了汉口保卫战。这时他与詹大悲认识，从此他们并肩战斗。詹大悲立即将新识的朋友介绍给董、张。李汉俊很快成为他们的思想中心，尤其对董必武来讲至关重要，他的思想完全受这位比自己小4岁的年轻人的支配，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

董必武，名贤琮，15岁时改名用威，号璧伍，“必武”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以号代名时，用号的谐音。他于1886年3月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与李汉俊一样，他生活在一个清贫的教书先生的家庭里，所不同的是，他受到传统儒学的教育要比李

汉俊深得多。17岁时就中考，但风雨如磐的社会没有使他沿着求“功名、做官”的仕途走下去，而走上了造反的道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爆发时，他毅然割掉了辫子，参加了革命，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民国初，他为了民主共和，二次入狱，二次亡命日本。1918年到鄂西，担任鄂西靖国军秘书，投入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斗争。次年春，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遇害，到上海向孙中山求援，请他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然而“孑然无助”的孙中山除了表示同情外，也是无能为力。

从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从秘密反袁军事行动到公开的护法战役，一次次的流血拼搏，一次次的惨痛失败，使董必武陷入深深的迷惘和困惑之中。他开始认识到旧路——孙中山的依靠军阀打军阀是绝路，革命要从头来。新路在何方？

李汉俊成了他的指路人。他们这四个湖北佬几乎天天见面，热烈讨论匡时济世之良策。李汉俊向他们介绍了十月革命和苏俄的情况，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日本进步杂志《黎明》、《改造》、《新潮》等推荐给同乡。董必武等虽然一时看不甚懂，但他们抱着浓厚的兴趣认真地阅读。他们的生活是清贫的，詹大悲将自己衣服和蚊帐也拿出去典当，与董必武共穿一件长衫，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却是非常富裕的。他们废寝忘食地学习，一心一意地读书，领略其中精义。

他们在一起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看到人民群众极大的革命力量，备受鼓舞。革命之路如何走？他们经常商量这件有关国家命运的大事。董必武与张国恩初步的想法是回到武汉办一份为人民说话的报纸，拟定报名为《江汉日报》。1919年8月，董拿着孙中山先生给的100元川资回到家乡，用其中的40元印刷了股票、章程、宣言等，积极筹募基金。后因筹款困难，这一计划无法实现。他和张国恩又准备从改造湖北教育会和办学校入手，以